

蘇軾黃州時期社會詩創作的思想探源

Su Shi's Creative Thinking on Society Poetry in Huangzhou Period

楊宗錫

Yang Zong-Xi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科學組講師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摘要

宋神宗元豐二年，發生了「烏台詩案」。蘇軾以詩文批評時政，受人構陷，入獄幾至於死，其後謫居黃州時，雖以罪人之身，屢次表現「不復作詩與文字」的戒慎恐懼心態，卻依舊關心民生疾苦，寫下三首反映民情、針砭時弊的詩歌——〈陳朱村嫁娶圖〉之二、〈五禽言〉之三、〈魚蠻子〉。本文從蘇軾初貶黃州時的心境談起，進而溯及蘇軾的政治抱負、文學思想，以探求其此一時期仍能創作此類詩歌的精神力量所在。

關鍵詞：蘇軾，〈陳朱村嫁娶圖〉，〈五禽言〉，〈魚蠻子〉

Abstract

Ancestor Yuanfeng two years, there have been "Wutai poem." Sushi criticism to poetry when politics, was framed, almost died in jail, followed by exile Huangzhou sinner, though to the body, repeatedly show "no longer writing poetry article" avoiding fear mentality, but still concerned about the plight of the people, write down three reflect public sentiment, point out problems of poetry - *Chen Zhucun marriage Figure bis, five kinds of birds, then ter, fishermen*. From the beginning Sushi mood when banished Huangzhou Talk, thus retroactive political aspirations, literature Sushi thought to explore their creative spirit of this period still lies the power of this kind of poetry.

Key Words: Sushi , *Chen Zhucun marriage Figure bis , five kinds of birds, then , fishermen*

壹、前言

元豐二年（西元 1079 年）烏台詩案爆發，蘇軾在多方營救之下，最後以宋神宗旨意——「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結案。¹翌年元月初一，蘇軾離開汴京，在赴黃州經蔡州的貶途中，因遇大雪，寫下〈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詩中有云：「下馬作雪詩，滿地鞭撻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²從中可見，蘇軾雖以詩文批評時政，受人構陷入獄幾至於死，然而遭貶後依舊以詩歌表明自己關心民生疾苦的初衷和心跡。

同月下旬，於岐亭見故人陳慥，為其所藏〈陳朱村嫁娶圖〉題詩³，寫下「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詩句。⁴同一年於黃州貶所，有詩〈五禽言〉，其中又道：「不辭脫襌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⁵

元豐五年（西元 1082 年），於黃州第三年，蘇軾作〈魚蠻子〉一詩⁶，以漁民的生活為題材，表達對其「何異獮與狙」處境的深切同情，同時發出「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的感慨。此後直至元豐七年（西元 1084 年）四月量移汝州未再見到此類詩歌的創作。⁷從踏上黃州貶途開始，至調離黃州一共四年兩個月的時間，蘇軾寫

下了三首社會詩，反映實施新法下人民飽受苛租重稅的苦楚。

其實，就整體詩歌篇數來看，蘇軾關於政治、社會的創作，占其總量的比例並不大，然而誠如吳鷺山等人合著的《蘇軾詩選注》前言所述，蘇軾創作的詩歌「題材豐富，內容廣闊，幾乎現實生活中的一切，無不進入詩作。而表達詩人對於政治和社會現實的態度和觀點的政治詩，所占比重雖不大，卻是蘇詩的重要部分」。⁸類似的意見也在王水照《蘇軾評傳》中見到，認為蘇軾這些詩「表達了詩人的政治態度和對於社會重大問題所持的觀點，仍是蘇詩的一個重要內容」。⁹

由此可見，蘇軾此類型詩歌自有其受到重視的價值所在。

所謂「詩言志，歌詠言」¹⁰，古來許多受到推崇的詩人，不僅能在詩中反映廣泛的社會內容，並且也能夠鮮明地表現自己的個性。因此，雖然蘇軾於貶謫黃州時期關於社會、民生議題的詩歌創作只有三首，但本文之所以聚焦於此，主要是從烏台詩案到謫居黃州，是蘇軾一生經歷的重要轉折，蘇軾因詩入獄，在獄中亦曾寫下「魂飛湯火命如雞」的絕命詩¹¹，但從貶赴黃州的途中開始，所作抨擊時弊的詩篇，與其遭貶前所寫的並無兩樣，充分顯示蘇軾未因牢獄貶官之禍，而改變其揭露社會弊端的性格，所謂「悲歌為黎元」，並非為詩造情的書生說辭而已。蘇軾曾說

¹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0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19 冊），頁 191。

²《蘇東坡全集》前集卷 11〈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頁 165。

³參見孔凡禮《蘇軾年譜》卷 19，頁 472。

⁴同註 2，前集卷 11〈陳季常所畜朱陳村嫁娶圖二首〉，頁 168。

⁵同註 2，前集卷 12〈五禽言 并敘〉之三，頁 172。

⁶同註 2，前集卷 13〈魚蠻子〉，頁 183。

⁷同註 3，卷 23，頁 613。

⁸吳鷺山、夏承燾、蕭湄合編《蘇軾詩選注·前言》，第 6 頁。

⁹王水照《蘇軾評傳》，第 439 頁。

¹⁰漢·孔安國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 2〈虞書·舜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 冊），頁 70。

¹¹《東坡全集》卷 29〈獄中寄子由二首〉之二：「柏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7 冊），頁 414。

「頭雖長低氣不屈」¹²，這其中必然有其個人思想特質作為支撐的力量，筆者以為這股力量便是體現於蘇軾的政治抱負與文學主張的儒家淑世情懷。對照蘇軾受貶初期的惶恐心境，更可以感受這三首詩歌創作背後所呈現的精神意義。

於是，本文以下擬從蘇軾初貶黃州時，「不復作詩與文字」的戒慎心態談起，進而溯及蘇軾的政治抱負、文學思想，以探求支撐蘇軾黃州時期繼續創作社會詩的思想力量所在。

貳、「不復作詩與文字」——蘇軾初貶黃州的戒慎心態

烏台詩案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貶赴黃州途中，蘇軾所作詩文時常流露出一種失意挫折中的反省，故而有「失身」、「吾身如寄」之嘆，如「塵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可鄙」¹³、「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¹⁴、「不悟俗緣在，失身蹈危機。刑名非夙學，陷穽損積威」¹⁵；此外，蘇軾亦多處自稱「楚囚」、「逐客」、「放臣」，如「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說黃州；此生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囚」¹⁶、「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¹⁷，與至黃州之後的「索漠齊安郡，徙來着放臣；如何風雪裏，更送獨歸人」¹⁸，這些詩都表現出遷客騷人徬徨、沉痛、不平的感慨，以及忠而被謗、報國無望的怨悱之嘆與寂寞之感。然而，也是在同一個月內，在失身如寄與逐客放臣的心境之中，蘇軾仍然不忘對苦難人民

的悲憫，寫下〈陳朱村嫁娶圖〉「縣吏催錢夜打門」之句。

而因所有的沉痛不平、怨悱孤獨，都為詩文而來，蘇軾對此自然有所警省。其實，早在神宗熙寧四年（西元 1071 年），蘇軾倅杭時，因其文章好譏刺，好友文與可即寫詩勸過他：「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¹⁹熙寧九年（西元 1076 年）於密州時，蘇軾亦有「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²⁰、「慎毋及世事，向空書咄咄」²¹的牢騷警惕，蘇轍也曾上書神宗，說蘇軾「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僚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²²，儘管如此，但仍舊因詩文為政敵羅織構陷而入獄。

雖然，從烏台死裏逃生的蘇軾，剛出獄時不無輕鬆而大意、再次負才使氣的寫下諸如「却對酒杯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中不關少年鷄」等詩句²³，似乎又恢復了入獄前的那個蘇軾的意氣。然而烏台詩案的打擊實在巨大，因此謫居黃州的第一年，蘇軾所作詩文的字裏行間，便處處顯現出一種臨淵履薄、戒慎恐懼的情緒，詩如「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裡狂言醒可怕」²⁴、「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²⁵，對過去的一場文字獄經歷，以及將來是否還會有類似的災禍，餘悸猶存。在給朋友的信裏則說：「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

¹²同註 11，卷 3〈戲子由〉，頁 80。

¹³同註 11，卷 11〈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頁 187。

¹⁴同註 11，卷 11〈過淮〉，頁 187。

¹⁵同註 11，卷 11〈游淨居寺并敘〉，頁 188。

¹⁶同註 11，卷 11〈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携手河堤上作此詩〉，頁 186。

¹⁷同註 11，卷 11〈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頁 186。

¹⁸同註 11，卷 12〈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為誦此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頁 200。

¹⁹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 18〈評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4 冊），頁 466。

²⁰同註 11，卷 7〈七月五日二首〉，頁 138。

²¹清·查慎行《蘇詩補註》卷 14〈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1 冊），頁 289。

²²宋·蘇轍《樂城集》卷 35〈為兄軾下獄上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2 冊），頁 390。

²³同註 11，卷 29〈出獄次前韻二首〉，頁 414。

²⁴同註 11，卷 11〈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頁 190。

²⁵同註 11，卷 11〈次韻前篇〉，第 1107 冊頁 190。

覺累幅，亦不須示人。」²⁶雖然只是與朋友的書信往來，不是刻意寫文章，但不知不覺寫得多了，還特別叮嚀無須再讓第三者看到。以及，「來詩愈奇，欲和，又不欲頻頻破戒，自到此唯以書史為樂」²⁷，朋友寄來的詩歌讓蘇軾詩興大發，雖想和詩但得強行忍下。友人欲相見，蘇軾回覆道：「黃當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為良。……雖廢棄，忘為國家慮也。」²⁸這是怕拖累他人，連朋友也不敢相會了，但還是不忘補上一句，表明未忘懷國事的心志。不敢作詩，不敢會友，這時的蘇軾甚至黃州也不敢離開；好友陳慥邀他赴武昌一遊，他回信謝絕：「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雲擅去安置所而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²⁹總之，謫居黃州初期的蘇軾，猶如驚弓之鳥，自稱「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理由是「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³⁰，可見烏台詩案在其心裏所造成的巨大陰霾。

然而，即便蘇軾再三表明了深自反省的心境，警惕自己「不復作詩與文字」，但一邊反省警惕的同一年內，一邊還是寫下〈五禽言〉中的「水中照見催租癡」。兩年之後，再寫下〈魚蠻子〉，對新法擾民，以「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³¹，表達諷刺之意。如此不顧謫宦之身，在台詩案陰影的壓力下，仍接二連三地寫下譏諷時政弊端的詩歌，背後支持的思想力量，是蘇軾體現於政治抱負與文學主張的儒家淑世情懷。

參、蘇軾「奮厲有當世志」的政治抱負

從家庭環境來看，蘇軾自小接受正統儒家思想的教育。蘇軾母親程氏夫人出身於蜀中大族，知書達理，熟讀經史，於蘇軾啟蒙時期，曾用東漢名臣范滂的行誼教育蘇軾，使少年時期的蘇軾便「奮厲有當世志」³²；司馬光稱讚她教育子女有方，「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厲之」、「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慮高絕，能如是乎？」³³而蘇洵對蘇軾、蘇轍兩兄弟的教育，亦是「齟齬授經，不知他習」。³⁴正是這樣的家庭教育背景，蘇軾進入仕途以後，在政治主張與作為上，皆持守儒家的淑世精神，身體力行。

於宋仁宗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的〈思治論〉中，蘇軾針對當時「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等社會、政治積弊³⁵，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為了促使朝廷「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³⁶熙寧二年（西元1069年）初，王安石開始變法；蘇軾寫了〈議學校貢舉狀〉反對王安石改變科舉制度，神宗親自召問並對蘇軾說：「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蘇軾以「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勸諫神宗；³⁷接著蘇軾寫了〈上皇帝書〉，提出「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的建言。³⁸蘇軾並非不贊同改革，只不過在方法步驟上與王安石看法不同；蘇軾認為當時國家積弊如病人疾深體弱，不可投以猛藥，急於求治只會適得其反，不能操之太急。於〈再上皇帝書〉中更進一步說：

²⁶《東坡全集》卷73〈答李端叔書一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8冊），頁194。

²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卷64〈與王定國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53冊），頁209。

²⁸同註26，卷77〈與滕達道二十四首〉，頁245。

²⁹同註26，卷80〈與陳季常九首〉，頁288。

³⁰同註26，卷81〈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頁303。

³¹同註2，前集卷13〈魚蠻子〉，頁183。

³²同註11，〈東坡先生年譜〉，頁29。

³³宋·蘇洵撰《嘉祐集》附錄卷上〈武陽縣君程氏墓誌銘（作者：司馬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4冊），頁978。

³⁴同註33，卷12〈上張侍郎第一書〉，頁939。

³⁵同註11，卷44〈思治論 嘉祐八年作〉，頁605。

³⁶同註11，卷53〈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首〉，頁744。

³⁷同註11，〈本傳〉，第1107冊，頁8。

³⁸同註11，卷51〈上皇帝書〉，頁704。

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則足以生變。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大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閒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³⁹

這段話對新法進行了諸多批評，甚至斷言力行新法會導致社會混亂、國家滅亡。其後因政敵的攻擊，蘇軾自請外放，出任地方官，然而政治上的主張與牢騷不滿，一再地表現在文字上的「託事以諷」，如於〈湖州謝上表〉中便寫道：「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⁴⁰這些話看起來自謙，但實際藏著怨刺之意；其中「新進」、「生事」等用語，又一次得罪新法人士，於是群起彈劾蘇軾，蘇軾被捕入獄。

蘇軾對政治理念堅持的態度，除了與家庭教育、神宗皇帝的賞識有關之外，也應當看到宋朝政治制度與風尚的影響。

首先是宋太祖鑑於五代十國軍人以武力干政篡位的弊病，除了杯酒釋兵權，採取強幹弱枝政策，還改進科舉制度，增加進士的錄取名額，培養文官，更定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的祖訓⁴¹，大力提升文人地位，以鼓勵士人參與政治活動。其次，宋仁宗將禦史台和諫官的職權獨立並且擴大，特許台諫官可以「風聞言事」⁴²；影響所及，於當時代議論朝政時弊便成為社會風潮，如曾鞏便曾說：「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⁴³程頤也說當時士人是：「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⁴⁴蘇軾對於這種政治制度與風潮也抱持肯定的態度，曾說：

然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⁴⁵

趙宋朝廷對諫爭的寬容提倡，形成士人抗顏直諫，不畏強權，只管是非對錯的政治風尚，對蘇軾產生一定的影響，從其自稱有「制科人習氣」便可看出：

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饒饒至今，坐此得罪幾死。……妄論利害，攬

³⁹同註 11，卷 51〈再上皇帝書〉，頁 715。

⁴⁰同註 26，卷 67〈湖州謝上表〉，頁 101。

⁴¹元·陶宗儀撰《說郛》卷 39 上，引陸游《避暑漫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8 冊），頁 143。

⁴²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卷 98〈上仁宗乞禁止臣寮上封章告人之罪（作者：呂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32 冊），頁 202。

⁴³宋·曾鞏撰《元豐類藁》附錄〈墓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8 冊），頁 783。

⁴⁴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卷 4〈伊川先生·年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8 冊），頁 440。

⁴⁵同註 11，卷 51〈上皇帝書〉，頁 712。

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⁴⁶

這裏的制科，指的是嘉佑六年（西元 1061 年），蘇軾考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⁴⁷「賢良方正」始置於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其目的為「納天下言」，即廣泛聽取對國政的意見，多與「直言極諫」相連，這是皇帝「求言」的一種方式，故稱作「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亦即，蘇軾考上本科可以針對時弊，表達自己的觀點，提出建言。然而在朝廷時，蘇軾可以透過奏章直言不諱，但外放或貶謫之後，對於時事弊政的意見無法上達天聽，所以便經常在詩歌中直接描寫出來，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中便清楚地點出蘇軾寫作這類詩歌的動機：

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⁴⁸

王安石變法，一班大臣勸戒不果，朝廷毅然決然實施青苗、助役之法，規定收租要錢不要米，結果演變成錢荒米賤，人民繳不出錢，官吏逼債的現象。而蘇軾出獄後謫居黃州，雖如驚弓之鳥，多次表示不敢再作詩與文字，卻不顧個人可能再次受到政敵的攻訐，還是透過詩歌描寫社會現象，間接傳達其政治理念。這個時期所寫的三首社會詩：〈陳朱村嫁娶圖〉：「縣吏催錢夜打門」、〈五禽言〉：「水中照見催租瘢」、〈魚蠻子〉：「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表現了悲憫生民的情懷與有補於國的使命，而其創作背後的思想力量，正是體現於政治抱負的儒家淑世精神。

同時，蘇轍所說的「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也正是下一節要論述的，蘇軾「詩須要有為而作」的文學主張。

肆、蘇軾「詩須要有為而作」的文學主張

《詩·大序》說道：「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又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⁴⁹直接闡明詩歌具有政治教化、諷諫的作用，而就蘇軾主觀意識以及社會詩的創作來說，也符合這一從《詩經》而來的傳統「詩教」；除了前面蘇轍說的「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蘇軾於元祐三年十月〈乞郡劄子〉中，向哲宗申述自己因詩獲罪的原因時也說：

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仍復作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⁵⁰

這正說明蘇軾被指控的詩歌，確實寓有「託諷」的內涵及主觀用心，而其「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的話，也正是《詩·大序》「下以風刺上」的翻版。

「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這些遵循「詩教」精神的話，並不是蘇氏兄弟為了向皇帝辯解才提出的搪塞說辭，蘇軾重視文學的政治教化、諷諫功能，許多地方都能看到這樣的主張。

於〈題柳子厚詩〉中，蘇軾說道：「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

⁴⁶同註 26，卷 73〈答李端叔書一首〉，頁 193。

⁴⁷同註 3，卷 4，頁 91。

⁴⁸同註 22，《後集》卷 22〈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第 1112 冊，頁 761。

⁴⁹漢·鄭氏箋、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卷 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 冊），頁 116-121。

⁵⁰同註 11，卷 55〈乞郡劄子〉，頁 772。

新，乃詩之病。」⁵¹所謂「詩須要有為而作」，意義極其明確，亦即寫詩必須充分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有所勸誡，有補於世，因此反對徒然追求文字內容的奇新，認為這是詩歌創作的缺點。

什麼是「有為而作」？蘇軾在〈鳧繹先生詩集敘〉中，敘述了父親蘇洵遊學京師歸蜀後對自己說的話：「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⁵²這話表達了蘇洵對不良文風的批判，蘇軾先借以表示對蘇洵文學觀的繼承，再借由對鳧繹先生詩文的評價，進一步提出自己的文學理念，說道：

先生之詩文，皆為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

53

明顯標舉的是詩文經世致用的實用價值，其中「言必中當世之過」，亦是蘇軾對自己詩文的觀照。

而對「好奇務新」、「枝詞以為觀美者」這一類重視辭采的詩文，蘇軾曾將其與國家興亡相提並論，於〈答喬舍人啟〉中說道：

某聞人才以智術為後而以識度為先，文章以華采為末而以體用為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將廢也，取其後而棄其先。用舍之間，安危攸寄。⁵⁴

華采是創作中的末節，而體用指文章的思想內容與社會作用，這才是根本。蘇軾將文章「體用」、

「華采」之本末，與國家的興亡聯繫起來，強調「以體用為本」，這也正是蘇軾詩歌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思想張本。

蘇軾尊崇《詩經》「風雅」的譏刺作用，於〈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中說：「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冀土腐餘安足夢。」⁵⁵於〈王定國詩集敘〉裡，推崇「藹然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⁵⁶，〈次韻張昌言喜雨〉中說：「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即諫書。」⁵⁷〈次韻朱光庭喜〉也說：「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⁵⁸凡此種種，都顯示蘇軾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推崇敢於揭露時弊的創作，這與杜甫、白居易以來的新樂府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於〈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中，蘇軾說：「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骨？……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意在批評學杜甫詩的人只知學形式技巧，卻不能深刻體認杜詩反映現實的精神。蘇軾更認為杜甫詩歌是「甚得詩人之本意」，曾說：

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甚得詩人之本意。僕雖不肖，亦當庶幾彷彿于此也。⁵⁹

這話明顯表達了對杜甫的嚮慕追隨；而蘇轍於〈東坡先生墓誌銘〉中說蘇軾的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⁶⁰，無論從思想或內容上來看，蘇軾基於「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目的而作的詩，確實具有杜甫「詩史」的精神。

⁵¹ 宋 陳鵠 撰《耆舊續聞》卷 10（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9 冊），頁 631。

⁵² 同註 11，卷 34〈鳧繹先生詩集敘〉，頁 482。

⁵³ 同上註。

⁵⁴ 同註 26，卷 71〈答喬舍人啟〉，頁 167。

⁵⁵ 同註 11，卷 24〈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頁 354。

⁵⁶ 同註 11，卷 34〈王定國詩集敘〉，頁 483。

⁵⁷ 宋 王十朋撰《東坡詩集註》卷 11〈次韻張昌言喜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9 冊），頁 188。

⁵⁸ 同註 11，卷 16〈次韻張昌言喜雨〉，頁 254。

⁵⁹ 同註 27，卷 64〈與王定國帖〉，第 1353 冊，頁 208。

⁶⁰ 同註 11，〈東坡先生墓誌銘〉，頁 27。

蘇軾這一類為民請命，反映社會的詩歌作品，在詩集中雖然佔的比例不大，但飽含著悲憫之情，字字句句都是控訴，如：

作於宋仁宗嘉祐八年（西元 1063 年）的〈和子由蠶市〉：「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閑。」⁶¹描寫同是蜀人，但樂役不均的現象。同年所作還有〈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寫道：

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愆，民勞吏宜羞。中間催早噢，欲學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九八休。渭水涸無泥，苗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遍求。

⁶²

詩中控訴官吏不顧農事與百姓的死活，苛重的勞役，讓田地荒蕪，百姓難以飽食。以及〈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誰憐屋破眠無處，坐覺村饑語不訕。」⁶³描寫農村破敗的景象。

作於宋神宗熙寧五年（西元 1072 年）的〈湯村開運河雨中督疫〉，其中「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⁶⁴，描寫開掘運河為人民帶來的悽惶場景。同年所作還有〈吳中田婦歎〉：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耙頭出菌鎌生衣。眼枯淚盡而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茹苦一月被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汗流肩赤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糲。賣牛納稅拆屋炊，膚淺

不及明年饑。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鬼兒。糞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歸。⁶⁵

詩中描述朝廷政策不當，導致穀賤傷農，以及對人民的征斂，導致人民生不如死的悲慘處境。

作於宋神宗熙寧十年（西元 1077 年）的〈除夜大雪留澠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其中「三年東方旱，逃戶連鼓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饑腸痛」⁶⁶，則描寫北方遭受蝗災、旱災饑民的痛苦。

於黃州時期所作三首（〈陳朱村嫁娶圖〉、〈五禽言〉、〈魚蠻子〉）已如前述，其中〈魚蠻子〉一詩，紀昀評論說：「香山一派，讀之宛然〈秦中吟〉也。」⁶⁷則分明指出蘇軾此詩繼承了白居易新樂府詩的精神；而白居易詩歌創作的主張，正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⁶⁸

及至晚年，蘇軾仍不乏這類的作品，如宋哲宗元祐八年（西元 1093 年）所作之〈送黃師是赴兩浙憲〉，詩中「哀哉吳越人，久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⁶⁹，寫的是南方水災侵襲下百姓的悲苦。宋哲宗紹聖二年（西元 1095 年），即使遠貶惠州，蘇軾仍寫下著名的〈荔枝歎〉，不但斥責唐時進貢荔枝導致傷害人民，以古諷今，更指名道姓地揭露當朝大臣「爭新買寵」，甚至暗暗譏刺當時帝王「致養口體何陋耶」。⁷⁰

蘇軾在許多州郡做過地方官，每到一地，都深入調查民情（如〈陳朱村嫁娶圖〉所言「我是

⁶¹同註 11，卷 1〈和子由蠶市〉，頁 57。

⁶²同註 11，卷 1〈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頁 62。

⁶³宋·邵浩編《坡門酬唱集》卷 2〈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46 冊），頁 477。

⁶⁴同註 11，卷 4〈湯村開運河雨中督疫〉，頁 89。

⁶⁵同註 11，卷 4〈吳中田婦歎〉，頁 92。

⁶⁶同註 11，卷 8〈除夜大雪留澠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頁 140。

⁶⁷《蘇詩評注彙鈔》卷 1〈魚蠻子〉，頁 857-858。

⁶⁸唐·白居易撰《白氏長慶集》卷 45〈書序·與元九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0 冊），頁 491。

⁶⁹同註 11，卷 21〈送黃師是赴兩浙憲〉，頁 317。

⁷⁰同註 11，卷 23〈荔枝歎〉，頁 339。

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關心民眾疾苦，為百姓除弊興利；蘇軾懷抱「但令人飽我愁無」的情操⁷¹，對危害人民的水、旱、蝗等天災，以及朝廷、官吏施政造成的苛捐重役等人禍都十分關注，常常在詩文中寫進其目見耳聞的民間疾苦，表達對黎民饑寒病痛的憐憫。然而，在蘇軾而言，寫作這些詩歌並不單純為了紀錄社會現象、表達憐憫，同時也是代人民立言請命，要發揮補察時政，達到「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的實質作用，范祖禹為此曾稱頌蘇軾，說道：「先生海內文章伯，窮年蒿目憂黔黎。」⁷²可以說是為蘇軾「詩須要有為而作」的文學思想與表現，作了最佳的註腳。

伍、結語

蘇軾幼承庭訓，自孩提時便有奮厲當世的儒家淑世胸懷。入仕之後，其政治主張並非囿於黨派門戶之見，所提建言皆出自肺腑良心，不計個人利害得失，是立基於國家興亡，以人民福利為考量重心。而在文學思想方面，因為秉持「詩教」傳統，注重文學教化、諷諫的實質作用，其社會詩歌創作雖是不多，但都具有「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的強烈用心。蘇軾曾說：「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⁷³政治抱負與文學主張匯流，便是其創作社會詩的思想動力來源。也因此，雖然烏台案爆發，遭遇人生最大的挫折苦痛，貶謫黃州初期，在政敵虎視眈眈之下，雖然戒慎恐懼，但在感時憂民情懷的驅使下，仍舊為民發聲請命，寫下〈陳朱村嫁娶圖〉、〈五禽言〉、〈魚

蠻子〉諸篇反映民情、針砭時弊的詩歌。甚至，此時期仍不減報國熱情，懷抱「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的志向。⁷⁴

此外，必須特別提出的是，筆者於本文中論述「奮厲有當世志」的政治抱負、「詩須要有為而作」的文學主張，其思想特質是貫徹於蘇軾一生的，不僅僅呈現於黃州時期；然而本文之所以聚焦於蘇軾此一生命歷程，正如前言所說，從烏台詩案爆發到貶謫黃州初期，是蘇軾一生經歷的重要轉折，在巨大的政治挫折及伴隨而來的精神壓力下，此時期創作的社會詩歌，更能凸顯其體現於政治抱負與文學主張的儒家淑世情懷，所產生的強大的支持力量。

「下馬作雪詩，滿地鞭撻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彷彿見到大雪紛飛、原野蒼茫中蘇軾的身影孤獨地向黃州走去，悲歌吟哦之聲卻不斷迴蕩在吾人心中。

徵引書目 (依徵引順序排列)

1. 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19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蘇東坡全集》，中國書店，1986 年 6 月。
2. 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3. 吳鶯山、夏承燾、蕭湄 合編《蘇軾詩選注》，天津：百花文藝，1982 年。
4. 王水照《蘇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5. 漢·孔安國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6. 《東坡全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7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⁷¹《東坡詞》〈浣溪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87 冊），頁 105。

⁷²宋·范祖禹撰《范太史集》卷 3〈謝子瞻尚書惠墨端溪硯二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0 冊），頁 105。

⁷³同註 11，卷 36〈思堂記〉，頁 512。

⁷⁴同註 11，卷 13〈謝陳季常惠一搢巾〉，頁 206。

7. 宋·王應麟 撰《困學紀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4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8. 清·查慎行《蘇詩補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1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9. 宋·蘇轍 撰《樂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1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0.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53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1. 宋·蘇洵 撰《嘉祐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4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2. 元·陶宗儀 撰《說郛》，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78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3. 宋·趙汝愚 編《宋名臣奏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32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4. 宋·曾鞏 撰《元豐類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8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5. 宋·朱熹 撰《伊洛淵源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8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6. 漢·鄭氏 箋、唐·陸德明 音義、孔穎達 疏《毛詩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7. 宋·陳鵠 撰《耆舊續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9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8. 宋·王十朋 撰《東坡詩集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9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19. 宋·邵浩 編《坡門酬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46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20. 《蘇詩評注彙鈔》，台北市：新興，民國 56 年。
21. 唐·白居易 撰《白氏長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80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
22. 宋·范祖禹 撰《范太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00 冊，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2 年。